

产业集聚困境研究: 回顾与展望

朱英明 杨 斌 周晓丽 朱 峰*

摘要: 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 本文对国内外产业集聚困境研究进行综述, 对我国产业集聚困境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研究发现, 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别。国外学者主要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方法, 研究欧洲联盟(EU)一体化过程中各种形式的集聚不公平的集聚困境; 国内学者则利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 研究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业集聚引致的盲目性、无序性和掠夺性等形式的集聚困境。我国未来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困境的资源环境约束、产业集聚困境的认知行为偏差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认知行为偏差和产业集聚困境间相互作用机理等方面。

关键词: 产业集聚困境 资源环境约束 认知行为偏差

一、引言

在产业集聚过程中, 各地区在获取了各种形式的集聚经济的同时, 也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集聚不经济, 由此导致某一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不同类型的产业在特定地域范围地理集中过程中净集聚经济利益(集聚经济-集聚不经济)的非最大化, 从而影响地区产业集聚的后续发展能力。一旦这种集聚不经济占据强势, 地区产业集聚便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较为困难的发展处境之中, 地区产业集聚困境(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lemma)问题由此产生。综观中国各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 我们会发现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困境, 例如逐底竞争和集群转移困境(王缉慈、张晔, 2008)、产业集聚边缘化困境(吴月越, 2007)、产业集群创新困境(朱明礼等, 2006; 田中伟, 2006)、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困境(胡大立、张伟, 2007; 魏剑锋, 2008)、产业集群升级困境(刘东、张杰, 2006; 张杰、刘志彪, 2007; 陈捷, 2008), 等等。研究发现, 产业集聚困境问题与地区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有关, 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而言, 产业集聚困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方面, 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级发展阶段的欧美地区, 产业集聚困境主要表现为区域不公平、社会不公平、环境不公平、集聚租金征收等形式的“集聚不公平”的困境。另一方面, 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地区, 则陷入了产业集聚的无序性、盲目性或掠夺性等形式的困境: 由于不顾地区产业集聚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各地区纷纷建立产业集聚区, 出现了“一县(市)多区”或“一乡(镇)一区”现象, 地区产业集聚过程中出现了产业集聚的盲目性现象(国办发[2003]70号文件^①; 工信部产业[2009]103号文件^②); 由于片面追求地方经

* 朱英明,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210094 电子信箱: yingningzhu0428@163.com; 杨斌、周晓丽,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210094 朱峰,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210009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源环境约束、认知行为偏差和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研究”(7107308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域产业科学集聚: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09YJA790103)、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政策研究软课题“全球价值链下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研究”(工信厅政[2010]46号)以及南京理工大学自主科研专项计划项目(2010GJPY061)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

①国办发[2003]70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中指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 一些地方和部门擅自批准设立名目繁多的各类开发区(包括园区、度假区), 随意圈占大量耕地和违法出让、转让土地, 越权出台优惠政策, 导致开发区过多过滥, 明显超出了实际需要, 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对此, 必须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②工信部产业[2009]103号文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工业合理布局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部分地区在产业集聚过程中也存在着园区数量和种类过多、规划滞后、主业不突出、服务不规范、企业关联度弱、资源集约性差等弊端和问题, 失去了产业集聚的优势, 制约了工业园区科学、健康发展。”

济利益,盲目追求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扩张,地区间对集聚要素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地区产业集聚过程中出现了产业集聚的无序性现象(王缉慈、张晔,2008)^①;由于不顾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依然沿用过去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低层次产业集聚模式,地区产业集聚过程中出现了掠夺性产业集聚现象(冯薇,2006)^②。自20世纪末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产业集聚困境,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目前,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产业集聚研究的前沿领域。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然后针对我国产业集聚困境的表现形式,指出我国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意义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国内外产业集聚困境研究综述

(一)产业集聚的区域不公平的困境研究

由于产业集聚会带来巨大集聚经济利益、规模经济利益和外部经济利益,所以产业集聚条件好、集聚规模大、集聚水平高的那些地区容易出现产业过度集聚的现象;那些产业集聚条件差、集聚规模小、集聚水平低的地区则会出现产业集聚不足的现象。产业集聚的区域不均衡现象的加剧引发了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区域间发展的不公平。为此,许多学者以区域公平为研究目标对产业集聚区域不公平的困境进行了探讨。

Behrens和Thisse(2006)构建具有流动资本的两国贸易模型,将市场规模差异与组织成本差异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中,将经济一体化解释为公司固定组织成本(Fixed Set-up Costs)的协调,研究公司固定组织成本在国家间的差异如何影响全球效率与空间公平间的权衡。研究结果表明,在固定组织成本对称性情况下,市场在哪里导致过度集聚,规划者就在那里选择非对称的组织成本,甚至更多的集聚。当消费者对多样化的边际偏好高时,规划者总是偏爱拥有更大集聚规模的大国的较低的组织成本。否则,规划者总是偏爱拥有较小集聚规模的大国的较低的组织成本。吴颖和蒲勇健(2008)运用空间经济理论,构建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将区域系统的差距问题转化为区域系统福利问题,研究区域产业过度集聚负外部性对区域总体福利的影响,并计算最优产业集聚的参数阈值。研究结果显示,在阈值范围内,区域系统内的适度集聚会带来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大于适度集聚阈值,则过度集聚的负外部性会对区域系统福利带来损失。模型支撑了我国区域政策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并对当前区域差距扩大和调整的必要性提出了理论解释。同时,明确指出政府有必要通过调整区域间的集聚效率和集聚条件,实现区域集聚度的空间协调,最终达到调整区域总体福利水平最优的政策目标。Dupont(2007)在内生地理增长模型中分析经济一体化对个人不平等和区域差距的影响。他假设溢出效应是地方化的,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地理集聚会促进学习的溢出效应和促进增长,降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不平等。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增长和增加收益,但却使得个人和区域不平等状况恶化。这引起公平与效率间的权衡,因为空间公平和社会公平在一体化过程中沿着不同方向演化。因此,他提出与众不同的政策在于增进地区间思想的交易(Trade in Ideas)。思想流动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学习溢出效应的全球化,对增长和不平等有类似货物贸易成本降低那样有益的结果,尽管它并不产生集聚。Suedekum(2006)将不可贸易的家庭物品作为第三个部门纳入NEG模型中,分析生活总成本的空间范围。与标准的NEG模型的预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边缘(C-P)结构能够内生地出现,在该结构中核心地区是更昂贵的区域。假如区域产业集聚过程中生活成本上升,那么核心地区没有获得名义工资溢价的不可流动的工人会经历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核心地区有更高的生活成本指数(COLIs)。江曼琦(2006)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表明,许多城市问题源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过度集聚和集聚密度不够,前者造成交通拥挤等问题,后者引起城市蔓延问题。所谓的城市问题不是城市发展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城市发展中对于空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造成的,是没有注重合理集聚的结果。西方国家目前倡导的城市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思想实际上是追求城市合理的集聚密度。杜瑜和樊杰(2008)将产业集聚导致都市区空间功能市场失灵的原因归结为:第一,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产业集聚的低效与无序;第二,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产业

^①王缉慈和张晔(2008)认为:“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很多集群中,‘逐底竞争’十分明显。浙江省企业调查队曾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专项调查,认为‘行业恶性竞争’(即逐底竞争)是影响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占被调查企业的39.5%。如永康县具有专业化分工的成本优势的滑板车生产出口量约占全国的90%。但一家企业研制成功某新产品,则上百家企业模仿,产品的生命周期只有2个月。”

^②冯薇(2006)认为:“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产业群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还有土地资源紧缺等因素也制约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依靠掠夺性地使用基础性资源驱动的高速增长越来越没有发展空间。”

过度集聚,从而过度接纳污染排放,造成环境恶化;第三,一些公益性基本公共服务业由于自身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容易导致空间过度集聚,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业空间非均等化,容易产生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二)产业集聚的社会不公平的困境研究

NEG在产业集聚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产业集聚形成机制方面。但是,由于经济主体的流动性,所以NEG模型包含新的无效率来源,因为公司和工人迁移通常不考虑对居住在新地区的经济主体带来的利益或损失,也不考虑对留下来的那些经济主体带来的利益或损失。因此,大多数相关研究并不考虑产业集聚的社会愿望问题,相关研究中是否有太多或太少的集聚(Too Much or Too Little Agglomeration)仍是不清楚的(Charlot et al, 2006)。换言之,相关研究中产业集聚是否是社会公平的产业集聚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为此,学者们对产业集聚的社会不公平的困境进行了探讨。

Ottaviano和Thisse(2002)针对欧洲联盟(EU)一体化过程引起的核心与边缘地区社会不公平问题,利用修改后的Krugman的C-P模型,研究拥有熟练/流动和不熟练/不流动工人的两区域经济中集聚的最优性(Optimality of Agglomeration)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运输成本高或低时,市场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或集聚,市场结果是社会所向往的。然而,对于运输成本的中间值来说,市场导致经济活动的过多集聚(Too Much Agglomeration),而经济活动的分散是社会需要的,并对这种无效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推断,低运输成本对应于小地区间的运输成本,高成本则是大贸易集团间的运输成本,中间运输成本则对应于中等规模地区比如EU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对于EU来说,在单一市场效应完成以后,EU范围内会有过多的地理集中,EU积极的区域政策应以效率为基础。Charlot等(2006)利用Krugman的C-P模型,借鉴公共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比较产业集聚和分散的两种市场结果,研究具有更好社会结果(Better Social Outcome)的产业集聚或分散的条件。尽管该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他们得出两个重要的政策结论:第一,区域间迁移战略是防止经济一体化引致的产业集聚损害边缘地区利益的重要战略;第二,当区域间迁移战略没有实施时,存在效率和个人公平间的权衡。Pflüger和Südekum(2008)构建简单的、分析上易于驾驭的NEG模型,研究产业集聚的社会愿望即他们所谓的最优集聚问题(Optimal Agglomeration)和有利于政策干预的效率观点。市场结果建立在熟练工人根据其自身利益进行区位决策的基础上,其区位选择通过市场调节的金钱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影响价格和其他主体的福利。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均衡的特征在于低水平自由贸易的过度集聚(Over-Agglomeration)和高水平自由贸易的集聚不足(Under-Agglomeration)。以集聚的市场趋势与社会需要的数量差表示的“金钱外部性净值”(Net Pecuniary Externality),是市场失灵的基本原因。金钱外部性净值在高自由贸易水平上变为正,表明集聚不足。除非与另外的拥挤力相互作用,否则集聚不足不会出现。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尽管区域政策的制定大多基于公平考虑,但是更加公平的空间资源配置也能够增加效率。从配置效率的观点看,当贸易一体化得到足够发展时,更大的集聚是社会需要的。

(三)产业集聚的环境损害的困境研究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外部性:一类是来自产业活动导致生活环境退化的环境污染,即环境负外部性,另一类为集聚正外部性(即集聚经济)。环境负外部性要求限制区域经济活动,而集聚经济的利用则要求促进区域经济活动,区域发展过程中必须在这两种外部性之间作出权衡。因此,研究这两种外部性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研究的重要内容。

Grazi等(2007)构建包括集聚效应、环境负外部性、区域间贸易和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两区域空间经济模型。按照建立在社会福利和生态足迹(EF)指标基础上的评价值,根据集聚效应、负外部性和贸易优势三种空间经济现象,对五种空间经济结构进行福利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环境负外部性大大超过经济福利的其他部分即集聚和贸易效应时,EF方法才能与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方法一致。Verhoef和Nijkamp(2002)构建包括环境负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的单中心城市的一般空间均衡模型,研究城市中两类外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地区空间结构的均衡,并与孤立的环境税和与外部集聚利益补贴相结合的环境税两种政策下的均衡相比较。结果表明,追求环境目标有时可能以降低集聚经济作为代价,但是有时也可能促进这些集聚经济。

最近几十年,各国各地区在强调环境公平的同时环境社会冲突现象却不断增加。在环境经济学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区域产业集聚效应。由于产业集聚现象是环境公平 and 环境保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需要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到环境公平分析中。为此,针对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环境损害,有些学者探讨基于环境

公平考虑的区域产业集聚困境问题。Hosoe和Naito(2006)考虑到产业集聚通过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将环境因素引入到NEG模型中,对跨边界的污染传播与区域集聚效应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人口的均衡分布取决于环境资本损害的模式,在跨边界污染存在的情况下,某些均衡的分布模式是可能的,并有多重均衡。环境征税政策对人口分布有较大影响,政府对其他区域生产的制成品征收环境税的政策能够降低区域集聚。Bowen等(2009)在对产业集聚和环境不公平的区域科学解释的研究中,明确将产业集聚纳入环境公平分析中,以新泽西州具有空气污染的工业设施的区位是否接近少数民族区位为案例,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是新泽西州具有空气污染许可证的工业设施区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从环境公平研究中删除它们将导致严重误导性的经验结果和结论。

(四) 集聚租金征收的困境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实现货物、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其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加剧。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各国(各地区)财政自主权的削弱,另一个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前者是税收竞争文献关注的焦点,后者则是NEG文献关注的焦点。伴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与区域产业集聚有关的税收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努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Andersson and Forslid 2003; Ludema and Wooton 2000)。由于EU的东扩,与产业集聚有关的税收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Coulibaly 2008)。相关研究主要回答的问题是,基于产业集聚的“集聚租金”(Agglomeration Rents)存在并可以被征收吗?

Kind(1998)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市场联系、贸易成本和国际税收政策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NEG模型,对产业集聚与资本征税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不仅考虑产业集聚的存在对最优税收政策的影响,而且考虑资本征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由此得出产业集聚对最优税收政策设计的含义。在产业集聚存在的情况下,即使资本在国际间完全流动,开放型经济中资本征税文献中零来源税不再是最优政策。通过正来源税,政府能够利用集聚力产生的区位惯性。作为产业集聚地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征收资本收入的来源税,能够增加一国的福利。在Forslid和Ottaviano(1999)的基础上,Andersson和Forslid(2003)构建了一个包括对流动和不流动劳动力征收比例税,税收用于生产公共物品的模型,研究税收对制造业生产定位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对流动劳动力征税的增加,流动要素分散的对称均衡是不稳定的。甚至对流动要素完全协调的税收增加,也使得对称均衡不稳定。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集聚力在一个地区变得具有支配力,因而对称均衡被打破,流动要素集中在一个地区的非对称均衡得以形成。征税的范围取决于生产是集聚还是分散。当流动要素集中时,集聚力引起的惯性使得税收没有变为最低,因而产生可征税的租金。Ludema和Wooton(200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流动要素在一个地区集中产生的惯性产生可征税的租金。Coulibaly(2008)构建税收差异与集聚租金间关系的NEG模型,利用瑞士自治市公司收入税率的数据库,经验性地评价可征税的集聚租金的存在。研究表明,具有较高集聚租金的自治市设定较高的公司收入税率,因而证实可征税的集聚租金的存在。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不同,上述的NEG文献关键的特征是定位的滞后现象,意味着因为需求和供给联系,生产一旦集聚在一个地区,生产往往粘滞在那里。核心地区流动要素产生集聚租金,集聚力将流动要素转变为半固定的流动要素,因此,这种集聚租金能够被地方政府征税。Baldwin和Krugman(2004)构建包括税收的NEG模型,研究存在重要的集聚经济和市场一体化情况下的国际税收竞争和协调。研究表明,由于产业集聚所产生的集聚租金,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将导致“竞争到顶”,而不是基本税收竞争模型(BTCM)中的“竞争到底”。由于这种集聚租金是贸易一体化水平的钟形函数,所以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间的税收差距也是钟形的。税收协调的政策可能使得所有国家的情况更坏,这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税收协调比较少见的原因。Borek和Pflüger(2006)在更接近现实的部分集聚的稳定均衡环境中,研究具有集聚的税收竞争问题。研究表明,与产业对称性分配的稳定均衡和产业完全集聚在一个区域的稳定均衡的结果不同,当只有部分集聚和流动要素没有获得集聚租金时,税收差异作为税收博弈的一种均衡出现,集聚力存在也表明没有必要采用税收协调政策。

(五) 破解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研究

针对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集聚的各种困境,国内外学者试图提出破解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措施,以便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陈佳贵和王钦(2005)针对区域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的行政区划锁定、社会资本锁定和价值链低端锁定等困境,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进行分析,明确指出中国产业集群的主要竞争优势还是低成本,处于集群发展的低端道路,存在支撑区域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缺口,他

们按照如何规避和摆脱锁定状态的思路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魏后凯(2004)针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下,中国加工制造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特点,提议中央有关部门制订并实施全国性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规划,设计产业集群的识别及分类指标体系,确定今后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集群领域和重点区域,并在技术创新、金融信贷、土地、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当前,要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制定有关产业集群的识别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刘树成(2005)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中明确指出产业集聚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产业过度集聚问题,他认为集聚效益的增加是一条倒U型曲线。当集聚程度超过一定点时,其效益服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任何集聚都是有一定限度的,特别是在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的今天,集聚的程度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以防止由于过分集聚引发过多的环境问题。刘世锦(2003)认为,产业集聚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在对我国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间的关系做出科学判断后,他明确指出,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杜瑜和樊杰(2008)认为,产业集聚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明显滞后于正外部性,若不采取措施规避,势必付出自然要素价格飞涨、资源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为此,需要根据不同产业空间发展需求,开展前瞻性的空间规划。同时,针对产业空间集聚自身具有的循环累积效应,进一步落实空间管制,使之既能充分发挥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又能在资源环境承载范围之内,规避过度集聚带来的负效应。Cambes等(2005)利用NEG方法,研究了集聚区域如何对经济环境的冲击作出反应的问题,他们考虑不完全劳动力流动、地方(土地)供应规制以及劳动力参与决策等空间政策含义,表明地方劳动力的集聚供应是区域应对冲击调整的基本决定因素。连远强(2006)利用羊群行为理论对产业集聚过程中羊群行为进行了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他建议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产业集聚过程中产生的羊群行为,正确认识并有效利用羊群行为及其效应,培养“领头羊”,吸引“群羊”,营造一个良好的产业集聚环境,同时要以循环经济模式和协调发展的理念来打造一种产业和谐集聚地。曹洪华等(2008)在对主体功能区集聚与布局的研究中指出,产业集聚既是主体功能区划的重要指标,也是主体功能区优化布局的要求。主体功能区规划正是在我国现阶段粗放式发展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短缺和区域差距扩大背景下提出的,旨在优化人地关系,指导各地区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六) 简要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但是现有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产业集聚困境的相关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国外学者主要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方法,研究欧洲联盟(EU)一体化过程中各种形式的集聚不公平的集聚困境;国内学者则利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业集聚引致的盲目性、无序性和掠夺性等形式的集聚困境。

三、中国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向

(一) 中国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意义

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区域产业集聚状况的变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变迁。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区域产业布局上主要以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思想,区域产业政策片面追求区域平衡目标,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均衡布局和地方工业自成体系,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的共同安排下,区域产业的低水平集聚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缓慢。改革开放后,区域产业政策将效率原则放到优先的地位,生产要素从低效部门和地区流向高效部门和地区,产业集聚环境形成并不断完善。生产要素持续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促进了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创造出的新增资源要求被配置到最有效益的产业和部门,东部发达地区产业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然而,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部分发达地区却陷入了产业集聚无序性、盲目性和掠夺性的困境。上述产业集聚的种种困境已经引起了学者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区域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经济要素的集约和优化配置,有利于行业间的融合和相互协作,有利于资源的共享和循环利用,是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and 合理布局的有效途径。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制造业的集中区、吸引投资创业的重点区和机制改革的先导区,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和重要支撑。因此,面对上述的区域产业集聚困境,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廓清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尽管学术界已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理论研究却相对薄弱,因而产业集聚困

境研究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面对资源性产品需求快速增加、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压力日益凸显等突出问题,区域产业集聚过程中迫切需要破解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措施。因此,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破解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政策措施,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的关联发展、成链发展、集约发展和合作发展,有利于形成集聚功能清晰、集聚导向明确、集聚秩序规范、集聚强度适当的区域产业集聚格局,因而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产业集聚困境未来的研究方向

目前,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但是我国现有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针对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背景下,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集聚、无序性集聚、掠夺性集聚等形式的集聚困境,我国未来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不同类型的集聚困境既受到区域客观因素(例如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也受到区域主观因素(例如认知行为偏差)的影响,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有必要对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

第二,产业集聚困境的资源环境约束研究。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决定了区域产业集聚的规模和程度,区域资源环境状况对区域产业集聚困境产生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缺乏对该问题的定量研究。因此,有必要借助现代研究技术(比如地理信息系统GIS),对于资源约束下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变动状况进行分析。

第三,产业集聚困境的认知、行为偏差研究。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对于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等理论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对于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盲目性、无序性和掠夺性困境等非理性集聚行为则无能为力。相反,从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角度入手,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该困境的内在机理。为此,有必要借鉴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从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入手,从微观上阐释产业集聚困境的行为机制和内在机理。

第四,区域资源环境约束、认知行为偏差、产业集聚困境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以往的研究认为,资源环境状况是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主因。但是,经济主体对于产业集聚的认知偏差、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行为偏差是否也是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的资源环境约束、经济主体自身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是否交织影响?这种交织作用是否进一步加大了资源环境约束,导致困境愈陷愈深?因此,有必要借助新的研究方法(比如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此问题进行定量刻画。

第五,破解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措施。现有的破解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以便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1. 曹邦英, 2006《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战略的实施》,《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期。
2. 曹洪华、闫晓燕、黄剑, 2008《主体功能区人口集聚与布局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西北人口》第1期。
3. 陈佳贵、王钦, 2005《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选择》,《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4. 陈捷, 2008《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研究》,《成都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5. 杜瑜、樊杰, 2008《基于产业-人口集聚分析的都市经济区空间功能分异:以我国三大都市经济区为例》,《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期。
6. 冯薇, 2006《产业集聚与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3期。
7. 胡大立、张伟, 2007《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困境及突破: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8. 江曼琦, 2006《从聚集经济利益谈我国城乡经济发展问题》,《学习与探索》第6期。
9. 连远强, 2006《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羊群行为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第4期。
10. 刘东、张杰, 2006《社会资本视野中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的制度解析》,《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
11. 刘树成, 2005《现代经济词典》,凤凰出版社。
12. 刘世锦, 2003《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浙江经济》第13期。
13. 田中伟, 2006《基于组织模式的集群创新困境及解决途径探析》,《软科学》第6期。
14. 吴颖、蒲勇健, 2008《区域过度集聚负外部性的福利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方法的模拟分析》,《财经研究》第1期。
15. 王缉慈、张晔, 2008《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困境摆脱与升级前景》,《改革》第5期。
16. 魏后凯, 2004《促进我国产业集聚的主要政策措施》,《经济研究参考》第95期。
17. 魏剑锋, 2008《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困境与突破》,《经济研究导刊》第17期。

- 18 文腊梅, 2008 《企业集群治理的困境与模式创新》,《特区经济》第 11 期。
- 19 吴月越, 2007: 《产业集聚: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视角》,《当代经济研究》第 1 期。
- 20 张杰, 刘志彪, 2007: 《套利行为、技术溢出介质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困境与突破》,《当代经济科学》第 3 期。
- 21 朱明礼、刘鼎、罗韬, 2006 《产业集群创新困境: 基于企业行为的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9 期。
- 22 严北战, 2009 《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学习面临的创新源困境及对策》,《经济论坛》第 5 期。
- 23 Andersson, F., and R. Forslid 2003 “Tax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5(2): 279–303
- 24 Baklan, R. E., and P. K rugnan 2004 “Agglomeration, Integration and Tax Harmoniz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8(1): 1–23
- 25 Behrens K., and J. – F. Thisse 2006 “Agglomeration versus Product Variety: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equalitie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6(5): 867–880
- 26 Borck, R., and M. Pflüger 2006 “Agglomeration and Tax Competi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0(3): 647–668
- 27 Bowen W. M., M. Atlas and S. Lee 2009.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Regional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43(4): 1013–1031
- 28 Charlot S., et al 2006 “Agglomeration and Welfare: the Core–Periphery Model in the Light of Bentham, Kaldor and Rawl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0(1–2): 325–347.
- 29 Cambes P. P., et al 2005. “Agglomer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atial Economy”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 311–349.
- 30 Coulibaly, S. 2008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Existence of Taxable Agglomeration Rents” Working Paper DEEP 01
- 31 Dupont V. 2007 “Do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Growth and Equity Conflict?”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6(2): 193–212
- 32 Forslid R., and G. Ottaviano 1999. “Trade and Agglomeration: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 Mimeo Lund University
- 33 Gazi F., et al 2007 “Spatial Welfare Economics versus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ing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and Trade” *Environment Resource Economics*, 38(1): 135–153
- 34 Hoesoe M., and T. Naito 2006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Transmission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5(1): 99–119.
- 35 Kind H. J 1998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Capital Taxation”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7/98
- 36 Ludema R. D., and I. Wootton 2000.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Fiscal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2(2): 331–357.
- 37 Ottaviano G. I. P., and J. – F. Thisse 2002 “Integr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3(3): 429–456
- 38 Pflüger M., and J. Südekum. 2008 “Integration, Agglomeration and Welfare”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3(2): 544–566
- 39 Suedekum, J. 2006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Costs of Living”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6(3): 529–543.
- 40 Verhoef E. T., and P. Nijkamp 2002 “Externalities in Urban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versus Localization – Type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in a General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of a Single–Sector Mono–Centric Industrial C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40(2): 157–179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lemma: Review and Outlook

Zhu Yingning¹, Yang Bin¹, Zhou Xiaoli¹ and Zhu Fe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lemma has become a frontier problem in academic field.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lemma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outlook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es in China.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much difference in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Foreign scholars investigate various forms of agglomeration dilemma, agglomeration inequality mainly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European Union (EU) using the method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Domestic scholars research the agglomeration dilemma in the form of blind out-of-order and predacity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using the method of traditional economics. Future stud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lemma in China will mainly focus on constrain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ognitive and behavior bias and interacting mechanism among 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ognitive and behavior bia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lemma.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lemma;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gnitive and Behavior Bias

JEL Classification R12

(责任编辑: 陈永清)